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基于阶级立场的科技理性批判 ——对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解读

张 盾 祁松林

[摘 要] 阶级观点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威廉·莱斯对马克思·舍勒控制学概念的批判中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根本立场。莱斯把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进行有效结合,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生态学转向。莱斯认为,人类对自然的需求必然要以社会条件为前提,但舍勒只研究整体对强力的追求,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它们相互冲突的成分,如此也就模糊了人与人之间基于生存斗争的相互冲突才是理解追求控制的历史动力的问题。在莱斯看来,科学技术的理性与知识本身并不导致对外部自然的控制,控制的真正对象只能是人。莱斯对控制观念的重释显然内蕴着阶级理论的批判维度,从而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政治哲学的理论底色。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政治问题,对生态问题的理论反思需要放置在政治哲学的整体框架内,解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立场的理论意义端在于此。

[关键词] 莱斯; 舍勒; 阶级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720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02)

[收稿日期] 2018-05-10

[DOI] 10.15939/j.jujss.2018.06.zx2

[作者简介] 张 盾,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 祁松林,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正如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而后才是一位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也首先是一种政治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31}。从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保持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去理解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意义。20世纪后期,加拿大左翼学者威廉·莱斯开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问题和新视域。在对莱斯思想的深入研究中,能够清楚辨析其阶级立场的批判维度,这一思想特质在他对马克思·舍勒的控制学概念的批判性解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认为,这也正是威廉·莱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绿色运动各类生态理论的关键所在。

一、控制自然的中立性表达: 舍勒“控制学”概念的理论旨趣

德国哲学家马克思·舍勒是现象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哲学人类学与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奠

基人。在有关知识社会学的系列著作中，舍勒对马克思主义持有一种批判态度。在《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舍勒主张先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并以这一理论设想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而断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压迫和批判造反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条件越来越不充分，马克思主义终将消失”^{[2]1264}。舍勒称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一种合乎人性的教育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反，在它这里，“上帝不仅存在于人的精神和意志当中……上帝及其永恒天意和世俗统治也一同参与了此岸世界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2]1274}。舍勒赞扬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认为它在此岸世界中保留了以“协作”为特征的基督教共同体观念。与此相反，舍勒却把一种“强制性”特征施加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之上，进而劝导人们来信仰基督教社会主义，主张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反基督教的强制性特征。

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旗帜鲜明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倾向在其相关著作中不时显现。作为现象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舍勒的思想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对舍勒思想的批判性解读也一直是相关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自觉的理论任务。作为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学生，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其代表作《自然的控制》一书中，他将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进行了有效结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批判的生态学转向。经过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深入研究，莱斯对舍勒有关控制学的概念进行了系统批判。莱斯认为，在把征服自然看作现代社会的一个社会目标并把自然科学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人们当中，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对这些观念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做了一种最为透彻、最为精辟的理想表述。^{[3]93}这一表述就是舍勒的控制学概念。但是，舍勒虽然对“科学”和“控制”之间的关系做了具有启发性的说明，但就其理解而言却是不恰当的。因为，舍勒把现代科学看做是人类为控制自然而设计的工具，试图论证科学知识本身的价值中立特征，但是，舍勒并没有注意到科学以工具性的实用操作方式去试图控制世界的设想本身是含糊不清的。正如莱斯认为，人类共同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毫无意义，能够进行控制的只能是服从他人意志的服从意识，也只有这样的服从意识才可能是控制的对象。

舍勒的控制学就是实证科学，表现为一种为使环境服从人的目的而自觉发展各种技术的形态。对舍勒而言，实证科学是其知识社会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证科学的目的是“用数学符号建构世界图景。这种图景有意忽视世界的所有‘本质’，而只接纳现象之间的关系，以便根据这些关系来支配和控制自然”^{[2]1108}。在舍勒的思想谱系中，与实证科学相区别的还有两种知识形态，即宗教与形而上学。这三种知识形态共同构成了舍勒知识社会学的整体结构。舍勒的区分对应于19世纪实证主义学派有关人类知识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实证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将人类知识的发展历程看作一个线性的历史进步图式，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宗教—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与实证的阶段。孔德认为这三种知识形态在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中依次更替，后者的繁盛势必会使前者不断趋向瓦解，直到最终消失。舍勒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这三种认识并不是人类知识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而是偕同人类精神本质一起给定的实质性的和永恒性的精神立场和认识形式。^{[2]1106}舍勒指出，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虽然都是人类精神起初便特有的使命和课题，但本质上却是截然不同的。宗教是关于拯救或者救赎的知识，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文化知识，实证科学则关涉着实用的知识，即关于控制自然界的知识。虽然它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空有着不同的作用，但从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各自具有独特的发展道路。舍勒进一步分析，实证主义之所以坚持三阶段法则理论，在于他们只把目光局限在欧洲这片狭小的土地，而把西欧社会过去几个世纪的知识运动形式当成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2]1109}于

是，舍勒全面考察了人类历史上不同区域的知识形态，进而得出结论：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有着不同的历史运动形式，它们分别是由三种完全不同的动机、认知精神活动、目的、位格类型以及社会群体所构成的知识形态，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2]1107}

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书中，舍勒还对知识形态的历史起源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舍勒认为，宗教知识的起源既不在万物有灵论与祖先崇拜，也不在理性的各种形而上学判断，而在于“得到群体承认的那些杰出个人与一个神圣的、异常强有力的个人自身之被人们深信不疑的经验性接触方面”^{[4]87}。形而上学则起源于摆脱了宗教传统与经济拖累的精英群体，从某种纯粹的理论态度出发，对世界的本质和各种事物的终极根源做出的观念性考察与或然性假设。舍勒着重指出，与形而上学不同，实证科学是哲学与工作经验联姻生下的孩子，它起源于有闲暇时间进行沉思活动的阶层与积累了工作经验的阶层之间的互动。因为，一方面，“科学只有在无拘无束的沉思过程的影响下，才能把它那纯粹是理论方面的认识方式、才能把它的逻辑学方法和数学方法，扩展到整个世界上去”；另一方面，“倘若这另一个群体的影响不存在，那么，科学就永远不会形成它与技术、测量以及后来的自由试验的本质性密切联系”。^{[4]114}而正是后一类群体追求增加社会自由程度和解放程度的内驱力，增强了人们对自然知识的兴趣，使得人们对自然的控制成为可能。关于这三种知识形态的性质，舍勒指出，形而上学与宗教分享着人们参与绝对存在的过程。宗教是通过信仰，通过对一个被人们认为在经验方面与上帝接触的人的无拘无束的顺从，以及启示、恩宠、启发、或者与上帝的某种本体性关系而进行的；形而上学则是通过“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重新思考的各种质料本身的、自发性的、凭借证据的认识过程而进行的”^{[4]108}。它们都是关于绝对价值观念的理论。但实证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它依附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形而上学分享着严格的合乎理性的方法，旨在运用有关自然的科学知识去支配和控制自然，服务于人类自身的目的。实证科学变得越完善，就越需要避免任何关于价值的决策。

基于以上分析，舍勒对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进行了抨击。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希望根据经济方面的生产关系将所有形式的知识与社会精神特质概念化，从而主张“不仅实证科学依赖于经济方面的各种生产关系，而且所有各种精神方面的成就也都是如此”^{[4]118}。舍勒坚持认为，只有实证科学才具有某种层面的依赖性，宗教与形而上学则拥有自己的自主性演化过程，受存在于它自己领域内部的自发性变化的支配。并且，即使实证科学依赖经济方面的各种生产关系，也只是因为这两个领域的发展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即领导者们的具有遗传性的内驱力结构。就两个领域本身而言是一种平行论模式。所以，在舍勒的知识社会学体系中，实证科学的发展根源于人类控制自然的意愿，而控制自然观念本身无涉于任何价值决策。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实证科学体现着普遍意义上人类自身的内驱力，它的对象本身必然是价值中立的。

二、控制观念的另一种理解：莱斯对舍勒“控制学”概念的批判

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威廉·莱斯发出疑问“在近三个世纪中，科学能够使人类增长能力，并且使人们能够比以往所知的任何东西都更大程度地控制了自然。其原因是什么呢？现代科学和以前的科学之间的何种差别造成了这种可能？”^{[3]79}莱斯认为，马克思·舍勒的控制学概念对上述问题作出较为全面的回答。但是，莱斯同样认为，当人们普遍认可人征服自然是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实现的观念时，人控制自然的全部意图就被这一论题所遮蔽了，并由此掩盖了一系列基本的社会矛盾。^{[3]91}莱斯进一步指出，虽然舍勒对科学与控制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具有启发性的

说明，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科学以工具性的实用操作方式去试图控制世界的设想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也就是说，在舍勒看来，科学技术并非理论——沉思科学在实践中的应用。在为科学的理论结构与技术应用的内在联系做出证明的时候，舍勒坚决主张，现代科学是由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基础发展而来的，这些概念本身先验地适合于技术的应用。^{[3]93}但是，他在试图表达这种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统一时，却悬搁了对技术应用中社会生存斗争条件的考察。

舍勒的控制学是近代自然科学从宗教与形而上学束缚下解放出来形成的关于控制的知识，也是为使环境服从人的目的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技术，即理论的科学结构与科学的技术应用之间的统一。与近几个世纪的成就相比，它在以往人类文明的历程中从属于其他知识形态，对环境的改变并不显著。直至17世纪哲学革命与科学革命的开启，使得以控制自然为目的的实证科学摆脱了宗教与形而上学的束缚，成为在现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知识形态。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实证科学植根于人们进行控制的意志，它的对象是价值中立的。控制学概念也进一步“把世界设想为价值中立的，这是人为了一种价值而为自己确定的任务，这种价值就是主宰和支配事物的生命价值”^{[3]98}。而事物的全部构成都可能为了人的使用目的而加以改造。不过，在莱斯看来，虽然这种知识的增长和对自然的控制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一方面，现代科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人类对于自然和物理世界的知识，但是人类控制自然的活动又总是处在社会关系的历史运动之中，这就不能回避知识的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问题；另一方面，虽然理论的科学结构与科学的技术应用在现实中的确每天都发生着生产性的相互作用，但是它们所涉及的控制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在某种场合是矛盾的。所以，如果想要解决知识增长的社会后果问题，那就必须将各种生产技术的形式与科学思想的形式当做分离的现象来看待。

但是，在舍勒的知识社会学谱系中，他的控制学概念却一再坚持科学与技术的先验性统一。舍勒指出，17世纪以前的欧洲文明，哲学和宗教的知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控制水平较为低下；17世纪开启的哲学与科学的革命，则以新的世界观取代了以往对世界的非实践的沉思态度，人们开始带着惊奇的目光看待自然，并开始运用理性的思维去探究自然的奥秘，试图从自身目的出发来支配和控制自然。^{[3]77}在舍勒看来，这种新世界观的转变把控制人降到了次要地位，而将控制自然作为现代时期权力意志的主要焦点。“权利意志”是尼采的概念，在尼采的基本意向中，“对知识需求程度取决于在一个族类中权力意志增长的程度：一个族类控制一定数量的实在以便成为它的主人，以便把它变成仆人”^{[3]96}。舍勒的控制学概念充分吸收了尼采的相关思想，在论述三种知识形态时，他指出控制学专门反映人类控制自然的意图，其目的在于对世界中可能的行动进行技术性设计，以便实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控制。所以，舍勒将现代科学的理论结构与科学的技术应用当做一个整体的活动看待，这种新科学的世界观以行动取代沉思，极大地扩展了人类主宰环境的能力。与此同时，舍勒也力图发现蕴含在新世界观转变中的价值转换问题。他指出，“中世纪追求权力是集中在对人实行统治，而新的对权力的追求是为了控制物，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把物改造为有价值的商品”^{[3]101}。在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的主导下，对自然的控制不但使社会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变，也越来越被解释成人在世界中能力的增长，这就让人们普遍把科学的发展、控制自然的发展和人类能力的发展看做是一回事，控制自然的行动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现代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兴趣所在。

针对舍勒的控制学概念，莱斯在对控制观念的深入剖析中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舍勒关于现代科学的概念结构是为了控制自然而设计的说法并不成立，舍勒也没有对控制自然观念中的严重的含混性进行应有的严密考察。莱斯指出，倘如舍勒所言，现代科学对自然控制的追求服务于人对权力的意志，但又是什么决定了它的性质？它又如何表现的呢？^{[3]109}莱斯批判道，舍勒坚持认

为科学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实用动机，表现的是人们控制自然的意志。然而，科学一旦采用工具的或实用理性的形式去控制自然，那么人类的实际需求就会成为它的目标。^{[3]103-104} 因此，莱斯首先否定了舍勒关于科学对世界的控制是一项实用事业的观点。人类对自然的需求必然以社会条件为前提，但舍勒只研究整体对强力的追求，却没有对人的目标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分析，如此也就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是追求控制的历史动力的问题。莱斯进而指出，只在一种操作的结构内去分析自然的科学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的发生，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考察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中科学的理论结构和技术应用的操作。倘若这个背景是世界范围的生存斗争，那么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就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一种辩证关系，在其中，冲突的每一方都会迫使对方去发展自己的科技。因此，莱斯认为，“在追求控制自然的意志中所反映出来的目标，不是各种目标和目的的简单集合，而是包含着相互矛盾的部的整体”^{[3]105}。那么，就此而论，也就不难理解现代科学的“实用”概念在对自然的控制中并不具有单义的所指，这也就让“控制”概念本身具有了双重含义：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自然的控制以及生存斗争的相互冲突中人对人的控制。

莱斯进一步指出，舍勒控制学概念本身的含混性，也让科学和技术作为现代社会控制自然的工具的作用变得模糊不清。一方面，舍勒试图解释新科学的世界观从沉思到行动的转变，并将此看作是对现代科学诞生的系统说明。舍勒认为，他在此阐释的不仅是一种有关哲学的运动，也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整体结构变化的一种描述。但是，正如莱斯所言，舍勒完全没有分析控制自然的观念作为科学和哲学思想转变的表现与作为社会冲突结构有关的现象之间的关系。^{[3]106} 所以，舍勒把科学方法论本身的合理性原则，简单地还原到社会变化的过程中，甚至以为通过对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就能够缓和可能的社会冲突。但这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另一方面，舍勒把现代科学的目标描述为构造理论（科学）和实践（技术）统一的计划，以为它的成功能实现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控制。虽然抽象地考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话，这一发展趋势的确表现为人类对自然控制程度的提高。但是，如果这种计划在实现的过程中对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产生了明显的不良后果，诸如生态遭到破坏、生物遭遇灭绝以及核毁灭的威胁，那么又该如何看待控制概念本身的含义呢？因此，莱斯认为，舍勒虽然对科学与控制之间的关系做了较好的说明，但是控制观念本身的含混性却并未得到应有的澄清。^{[3]107}

有鉴于此，莱斯在剖析舍勒控制学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遮蔽在控制自然观念中的控制本性。莱斯认为，“无论一种文明的科学意识多么优越，只要为生存而进行的暴力斗争存在，科学的这种属性本身就不可能培育合理的人类行为”^{[3]108}。莱斯将生存斗争的视角引入实证科学的思考，也就是将控制自然的观念放置在社会关系中考察。在莱斯看来，征服、权力、控制等概念并不能够恰当地直接运用于有关科学对自然成就的描述中。首先，科学进步本身并不等于对自然的权力的增长，权力与控制的概念只有联系到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时才能够得到恰当的应用。其次，作为控制自然的手段，任何科学与技术的操作都必然受制于社会因素的目的，只要在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力量不均，那么技术就必定会成为控制的工具。事实上，科学知识无法达到对外部自然的真正控制，而只有人才能够是控制的对象。莱斯说“如果控制自然的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即通过具有优越的技术能力——一些人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3]110} 人类共同控制自然的观念毫无意义。

三、阶级观点之再现：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1]31}。斗争意味着对立，而对立必然要求不同的主体。莱斯从生存斗争的视角揭示控制的本质，首先否定的就是舍勒控制学概念中控制自然的主体，他说“这项事业的假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这里的‘人’是一种抽象，当它以这种方式被使用时，只是隐蔽了一个事实，即在人与人的现实暴力斗争中技术工具发挥一部分作用”^{[3]109}。在莱斯看来，把人看做控制自然的主体，其中隐含着人的概念的普遍性含义，如果以此实现一项控制自然的集体事业，那么共同目标的有效性必然要求和平、有序的内部结构。但是，在任何阶级社会，基于生存斗争的内部冲突才是追求控制的历史动力，无论人类对自然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的控制，“某种社会阶级分化的内部冲突都使得人们的生产系统（控制自然是它的一个部分）不可能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种可能只能出现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3]76}。

莱斯从生存斗争的视角考察控制自然的观念，这是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原则。在莱斯看来，“权力和控制的概念不是在科学知识本身的意义上说的，只有联系到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才可以很恰当地使用它们。技术上的发展显然会加强统治集团在社会中以及在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力量”^{[3]108}。也就是说，科学与技术作为控制自然的手段，它在一切阶级社会中的发展总要受制于阶级分化的内部冲突，不可能孤绝于阶级统治的目的。虽然，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对知识形态的历史起源与运动形式做出了系统性阐释，但在探求现代科学的转变时，却坚持科学与技术的先验性统一，把科学合理性原则等同于社会生活整体结构的变化，使得控制学概念模糊不清。莱斯明确强调，必须将理论的科学结构与科学的技术应用放在特殊的社会背景、而不是一种操作的结构内进行考察，因为人类追求控制自然的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目标并非简单的集合，而是包含着较为复杂的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成分。^{[3]105}那么，舍勒的控制学概念只重视人类整体对控制强力的追求，却没有深入分析人与人之间相互冲突的因素，显然是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非历史性的考察。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原则出发，莱斯把生存斗争的内部冲突看作追求控制的历史动力，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阶级理论的基本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阶级概念解释人类社会的压迫和对抗性，阶级理论的核心要义即为“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作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相互对抗的阶级斗争，这既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也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5]。从阶级理论的基本观点来看，阶级分化的压迫、不平等和对抗性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这一历史事实的存在又从根本上支撑着阶级概念的合法性。从阶级理论的前提出发，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以往的历史时代都可以看到不同等级的社会划分，“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32}。然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却始终把压迫和对抗性解释为一种政治现象，试图以自由与平等的政治宣导来掩盖压迫无产阶级的历史事实。于是，马克思提出了经济政治性原则，并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真实的压迫形式，这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性所决定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时代里经济压迫才是最具根本性的压迫。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的劳动“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6]927}，但是他们除了能够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以外，自由得一无所有。换言之，“在这种自由的形式下却掩盖着统治、暴力和非正义的本质。这就最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新的压迫形式”^[5]。在这一压迫形式下，任何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都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政治现象中，这里的政治问题早已演化成一个经济问题，阶级分化的压迫、不平等和对抗性也最具根本性地反映在经济活动的领域中。

从马克思思想的回溯来看,莱斯对控制观念的重释显然内蕴着阶级理论的批判维度,也充分彰显着经济的政治性原则。莱斯指出,“在一切以阶级划分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中,个人周围的自然环境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实际的或潜在的他人的领地”^{[3]139}。自然环境的归属指认的就是私有财产的现实,而私有财产权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依据。莱斯认为,在前机械化的农业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低下决定了经济剩余的贫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全都不得不屈从于俭省的经济制度,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社会中生存斗争的内部冲突只能局限在较小的范围。而工业社会的来临,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劳动生产力可能的剥削程度随着工厂系统及其机器使用的不断扩大而加重,以至于社会冲突的程度发生了质的跳跃。莱斯指出,从抽象的意义上而言,人类统治自然的水平在任何时期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在现实中,从控制自然中获得物质利益的分配总是不公平的”^{[3]76}。因此,在阶级分化的社会,对于自然资源占有权的控制,更能恰当地体现生存斗争和控制自然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在一切阶级划分的社会,经济的剩余作为私人财产而被占有,对这种剩余的分配便成为生存斗争的焦点;另一方面,某些只能在特殊地区得到的自然资源普遍地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中,人们却无法对它们的平等分配达成一致,这同样增强了社会内部冲突的范围与激烈程度。私有财产权的现实必定阻止非所有者直接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物质资料,这就必然不断激发社会中基于生存斗争的内部冲突。因此,莱斯认为“对人的劳动的可能剥削的强度直接依赖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3]13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这些现实的个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519-531}。因此,人类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去实现对自然的控制,体现着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如舍勒等人所言,科学技术作为手段去实现一项征服自然的人类事业,在这一目标中,人们的确共同拥有控制自然的同等水平,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控制自然的理性与知识,它们的演变的确在某种层面上代表着人类能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切阶级划分的社会,尤其以经济的压迫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依靠私有财产权所确立的资本对自然资源及生产资料占有权的控制,就构成了对生产资料非所有者的压迫。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这一压迫形式则体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即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产阶级对作为劳动主体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压迫。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通过对自然资源及生产资料的控制实现了对无产阶级的控制,这就让阶级之间的经济对抗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规定,理解经济领域的对抗性,就必须使用阶级观点,因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只有看作阶级关系才能成为资本主义剥削体制的政治表征。莱斯同样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运动结果,“大多数的个人已经被剥夺了对物质生存资料的直接掌握,仅仅保留了他们的劳动力,在饥饿和难堪的贫穷胁迫下以供出卖”^{[3]123}。因此,在这一时代条件下,人们基于生存斗争的冲突必然会稳定地增长,在人与人的相互斗争中,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显然成为多数环境下的决定性武器。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私有财产权为立法根据的资本主义制度,由资本支配的工业化大生产利用科学技术的理性与知识试图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也同样因为资本对自然资源及生产资料占有权的控制形成了对劳动的强制,这就共同构成了资本对自然与劳动力的双重控制。莱斯把生存斗争的视角引入对控制观念的重释中,同样深刻地揭示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序言6}。莱斯指出,在舍勒的控制学概念中,不但控制自然的主体是一种抽象,而且也没有一个“自在的自然”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而存在,“有的只是与各种类型的人的旨趣有关的对于自然的不同观点”^{[3]122}。“自然”的歧义性也让控制自然观念本身存在诸多疑问。莱斯进一步指出,“控制自然似乎不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3]150}。因为,

“在已经成为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特征的持久的社会冲突条件下，自然环境总是或者表现为已经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被占用”^{[3]122}。资本主义以抽象的个人平等信条，把控制自然塑造成一种意识形态，假以普遍的名义遮蔽了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联系，也就以此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性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压迫与剥削。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虽然试图确定实证科学自身的中立性，并以此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科技理性的器尘所引发的精神危机，但却和资本主义一样割裂了自然与社会的联系，在观念中构造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图景。舍勒期望以基督教的价值观重塑现代社会的价值秩序，面对当代全球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希冀通过加强自然资源的开发来满足人的需要进而缓解社会对抗。在当今恐怖主义盛行、热核威胁蔓延与生态危机全面爆发的时代，这显然是一条根本错误的道路。

综上所述，作为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莱斯将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有机结合，不但重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性，也进一步揭示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后果与自然后果。在莱斯看来，一方面，“权力平等和个人自由的传说，连同在广泛民主条件下人民选择的幻想一起，仍然遮蔽着少数人决定统治多数人生活的现实”^{[3]148}，使得社会阶级之间真实的经济关系进一步神秘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通过科技理性对自然的控制来操纵人的需求、改变人的本能结构，产生了由过度生产与异化消费所触发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多方面的生态危机。与20世纪声势浩荡的主流绿色生态理论罔顾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不同，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正是通过阐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深刻地披露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爆发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也通过对马克思阶级理论与经济政治性原则的贯彻，充分彰显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事实上，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生态问题俨然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对于生态危机的哲学思考更需放置在政治哲学的整体框架之下，这从根本上凸显了解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阶级理论维度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2] 马克思·舍勒 《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 [3] 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
- [4] 马克思·舍勒 《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 [5] 张盾 《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5期。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白 刚 由 阳]